

# 論二戰後中國抗戰小說 與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關係

陳 穎

---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和美歐迅速掀起了反戰文學的創作熱潮。蘇聯的人道主義戰爭小說和美國的反法西斯主義反戰小說代表了戰後世界戰爭文學的主流。中國“十七年”的戰爭小說高舉的是“頌戰”旗幟,與世界戰爭文學主流逆行。新時期戰爭小說閃爍人道主義的微光,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有限鏡鑒,拉近了與世界戰爭文學主流之間的距離。

[關鍵詞] 人道主義 反戰小說 蘇聯戰爭小說 美國戰爭小說 中國抗日小說

[中圖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61 - 11

---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僅僅 20 年後爆發的又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破壞力最強、傷亡最慘重的全球性戰爭。儘管“一戰”結束時,歐美的反戰潮流與反戰文學創作風起雲湧,但對遏制戰爭的作用微乎其微,一邊是反戰文學的繼續問世,一邊是新的世界大戰烽煙再起。在強大和殘暴的戰爭機器面前,文學的反戰聲音顯得那麼無力和無奈。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雖然是協約國的一員,但對戰爭的介入十分有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則直接成為這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主力。歐美國家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後,戰爭反思的聲浪猶如大海的波濤一浪高過一浪,蘇聯也在戰後不久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後,戰爭文學開始告別了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單聲道,而發出了人道主義的呼聲。唯獨中國的戰爭文學是個例外,究其原因不單是文學自身的因素,還廣泛關涉政治、軍事、文化傳統等非文學因素。本文主要闡析 20 世紀下半葉(即戰後)中國抗戰小說與世界主流戰爭小說的離合關係。

## 上篇:與世界戰爭小說主流逆行的“十七年”抗戰小說

20 世紀下半葉世界戰爭小說主流是基於人道主義思想的以反戰為主題的小說。這主要是基於戰後蘇聯和歐美戰爭文學創作的主流趨勢而作出的判斷。

二戰結束後,歐美反法西斯戰爭文學與蘇聯衛國戰爭文學均在戰後迅速調整創作語境,從以文學主動介入戰爭走向對戰爭的冷靜審視。從蘇聯方面看,蘇聯在反擊法西斯德國侵略的戰爭(蘇聯稱“衛國戰爭”)中做出巨大犧牲,付出了沉重代價,加上戰爭期間的內部政治鬥爭,使戰後蘇聯

作家對於戰爭以及戰爭和人的關係認識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法捷耶夫早在1949年《在第一次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的演說》中就呼籲：“我們有義務高聲發出人道主義這一偉大的聲音去反對戰爭販子，因為構成全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千百萬普通人等待著我們這樣做。”肖洛霍夫也提出：“全世界的作家應該有自己的圓桌會議，我們的觀點可能有分歧，但把我們團結在一起的，則是那種在使我們成為有益於人的堅定方向。”<sup>①</sup>文學評論家尼古拉耶夫說：“文學的任務不僅在於指出人們如何‘獲得’勝利，他們的功勳、英雄主義和忘我精神如何影響了戰爭的進程。文學還必須講述另一個方面，講一講戰爭如何影響了人，影響了他的生活、他的命運。”<sup>②</sup>作家貝科夫也認為：“戰爭與道德，戰爭與個人——這是二十世紀如何藝術地理解人的本質的基本問題。”<sup>③</sup>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共黨內開始了對蘇聯歷史的反思，包括蘇聯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由於斯大林的獨裁專斷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而導致的蘇共黨內的殘酷鬥爭都在反思甚至清算之列。針對斯大林時期“對人的價值的蔑視”、“對人的不尊重”，“關心人、相信人、尊重人、愛護人”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社會高舉的人道主義旗幟，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更是把“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和平、勞動、自由、平等、博愛和幸福”以及“人與人是朋友、兄弟和同志”等口號寫進黨綱中。人道主義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之一，對包括戰爭文學在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是巨大的。1962年蘇聯文學界召開了“人道主義與當代文學”討論會，進一步確認了人道主義思想在蘇聯當代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由於執政黨的寬容政策和文藝界的倡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蘇聯戰爭小說創作中人道主義思想成為了主流，如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1957）比較全面地代表了這一階段的文學傾向，突出了人道主義、反映人的命運和寫真實的特點。小說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個卡車司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夫妻恩愛，兩女一子繞膝，有吃有穿有住，一家人其樂融融，可是自從被征召入伍，厄運就接踵而至，先是家中房屋被德軍炮彈擊中，妻子和兩個女兒被當場炸死，隨後當了炮兵連長的兒子在勝利日當天犧牲，索科洛夫自己也在戰鬥中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中受盡苦難，差點被槍斃。逃出德軍魔掌後，面對親人全部離世的沉重打擊，索科洛夫常常徹夜難眠：“唉，生活，生活，你為什麼要那樣折磨我？為什麼要那樣懲罰我？不論黑夜，不論白天，我都得不到解答，不，永遠得不到！”索科洛夫的遭遇是戰爭中許許多多普通人命運的縮影。

同時期反映蘇聯衛國戰爭的小說中出現了“戰壕真實派”作品，如邦達列夫的《營隊請求火力支援》（1957）、《最後的炮轟》（1959）在人道主義題材的深入開掘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小說直面戰爭中一個普遍而重要的倫理道德問題——“對別人的生命負責”，雖然戰爭必然以付出生命為代價，但生命對於每個人都是極其寶貴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什麼時候該付出，什麼時候不該付出，如何盡量避免付出，這是戰地指揮員必須認真考慮嚴肅對待的問題，也是戰爭中的一個哲學難題。在《營隊請求火力支援》中，以師長伊維爾捷耶夫為一方，以連長葉爾馬科夫為另一方，在對士兵生命負責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沖突：伊維爾捷耶夫執行軍部的命令，以兩個營的覆滅的巨大代價，換來戰役的勝利，似乎符合戰爭的鐵血邏輯，但葉爾馬科夫認為兩個營二三百條生命的殞滅是伊維爾捷耶夫只顧執行命令而不顧士兵死活的結果。“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每時每刻，甚至每分每秒都會發生流血和死亡。因此，如何對待自身和他人的性命是每個指戰員的職責問題，不僅是職責，而且是道德，甚至是有無人性的問題，把這一問題提到如此的高度，在蘇聯的戰爭小說中邦達列夫是第一人。”<sup>④</sup>《最後的炮轟》中，炮兵連長諾維科夫掌握支配全連戰士生命的權力，但怎樣得當運用這一權力，是他苦苦思索的問題。當一排長奧夫欽尼科夫在陣地上遭德軍伏擊被俘，諾維科夫想起他身上藏有部隊的火力配置圖，為了避免軍事機密的洩漏，他不得不果斷對圍著奧夫欽尼科夫的德軍

開火,但事後他又深深自責:“我把他打死了還是沒有打死呢?誰給我這權力?”“有過多少次,迫於形勢的嚴峻,他把人們派到誰也無法返回的地方去”,戰士科洛科利契科夫就被諾維科夫派去檢修線路犧牲了,假如他派別人去也同樣有去無回,因此,他得出結論:“善,純粹的善又在何處?在哪兒呢?在戰爭中沒有善,他沒見過善。”主人公把支配別人的命運與道德的善惡相聯繫,然而,在和平歲月中合乎道德倫理的舉動在殘酷的戰爭中卻未必,因為戰爭的邏輯支配一切。

1969年,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說《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問世,成為蘇聯人道主義戰爭小說的巔峰之作。小說故事情節並不十分複雜,准尉瓦斯科夫帶領高射機槍班的五名女戰士前去追蹤跳傘潛入後方破壞鐵路和運河的德軍。在與十六名德軍的周旋中,五位年輕的女戰士先後犧牲,這些美麗、美好的青春生命本來可以成為幸福的妻子、慈祥的母親,但法西斯侵略戰爭使她們失去了一切。這篇小說在從未體驗過戰爭的戰後蘇聯的年青一代中產生尤其強烈的反響,小說以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完美融合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經典。

從歐美情況看,<sup>⑤</sup>進入1950年代後,美國社會反共、排外的“麥卡錫主義”愈演愈烈,這股極右風潮也迅速波及文學領域。美國政府對他們所懷疑的人建立黑名單,進行所謂忠誠調查,同時,大肆查禁甚至焚毀所謂與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有關的書籍,美國社會變得更加專制和法西斯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一些二戰小說家把關注焦點從反德意日法西斯轉到反美國自身的法西斯傾向上,他們借描寫戰爭中美國軍隊內部的法西斯暴行影射美國社會的法西斯化傾向。大量曾參與過戰爭、並以筆為戎的美國作家戰後迅速調轉筆鋒,書寫戰爭的失序與罪惡。諾曼·梅勒根據自身戰鬥經歷寫成《裸者與死者》(1948),同年,歐文·肖出版《幼獅》,隨後約翰·赫西的《圍牆》(1950)、詹姆斯·瓊斯的《從這裡到永恒》(1951)等描寫二戰的重要作品接連出版。這些作家或直接參戰,或作為戰地記者直擊一線戰鬥,作品寫成時都才不過二三十歲。“據粗略統計,美國的二戰小說總計達1500到2000本之多。”<sup>⑥</sup>

與戰後蘇聯戰爭小說的“戰壕真實派”相類似,美國二戰小說中也產生了大量以表現具體戰爭行為為主要內容的“戰鬥小說”,這類小說著重表現具體的戰鬥、戰爭場景,較少涉及軍隊內部鬥爭和反戰文化,如哈里·布朗的《烈日下的行軍》,詹姆斯·瓊斯的《細細的紅線》,安東·邁勒的《大戰》、《曾是一頭鷹》以及詹姆斯·米徹納的《南太平洋的故事》等等。但是與塗抹了人道主義色彩的蘇聯戰爭小說略有差異的是,戰後美國戰爭小說中的更多作品遠遠超出了戰鬥層面或人道關懷視角,而進入對戰爭本質、戰爭後果的思考,表現了對戰爭和現實的強烈批判態度。這些戰爭小說並沒有把重點放在揭露德國法西斯的戰爭罪惡上,而把批判矛頭指向美國自身的法西斯傾向,“在作品中,他們往往把美國軍隊放在美國所謂自由、民主社會的大背景下,著重揭露了軍隊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在軍官和士兵、上級和下級之間產生的尖銳矛盾和沖突,抨擊了軍隊中的極端、殘暴、專制和獨裁作風,同時將軍隊比著美國社會的縮影,以軍隊為比喻,影射美國社會的法西斯化。”<sup>⑦</sup>《幼獅》、《死亡製造者》、《廣島浩劫》、《五號屠場》、《裸者與死者》、《從這裡到永恒》等是這一主題的代表作。《幼獅》中德軍中尉哈頓伯格、士兵迪爾斯特固然是殺人狂,而作為正義之師的美軍內部也充斥著反猶主義、種族歧視、專制壓迫等法西斯暴行。猶太出身的美軍士兵諾亞·阿克曼就備受戰友的欺凌,不得不以一對十,在和戰友格鬥中以肋骨被折斷、牙齒被打暴、鼻子被砸扁的累累傷痕為代價,為自己贏得尊嚴;美軍飛行員更是恣意狂轟濫炸地上目標,連救護車也不放過。正如小說中牧師對諾亞所說:“我們為了捍衛榮譽和家園,奮起抗爭,讓自己變得比他們更凶惡、更嗜血、更殘忍。如此這樣,就算我們最後贏得了勝利,也無法承認自己贏得了真正的勝利,因為我們所捍衛

的精神和道義早已在這瘋狂的廝殺中消亡殆盡。”格蘭·希爾的《死亡製造者》寓意軍人是戰爭的製造者，是死亡的製造者，無論是美軍的穆拉伊上校、布蘭登上尉，還是德軍的將軍、雷德爾中尉，本都可以避免死亡，因為和平的曙光已經降臨，但他們已經陷入一報還一報的怪圈中不能自拔，結果既製造了別人的死亡，也製造了自己的死亡。為避免繼續製造死亡，博士出身的布蘭登上尉曾滿懷和平誠意在陣前勸降，結果被雷德爾中尉故意射殺，布蘭登們的悲劇結局詮釋了戰爭的“謀殺與瘋狂”本質，表達了作者強烈的反戰意識。梅勒的《裸者與死者》中，師長卡明斯和他的副官赫恩的矛盾代表的是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卡明斯崇拜法西斯主義，認為法西斯主義比共產主義合理，只不過是錯誤地發生在潛能不足的德國，美國要通過戰爭把這一潛能轉化為現實，從而代替希特勒統治世界。正因為崇尚法西斯主義的強權，卡明斯經常隨意辱罵下屬，壓制他們의思想和言論自由，副官赫恩於是成了他經常泄憤和打擊的對象，因為哈佛畢業的赫恩從大學帶來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而且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對美國軍隊中長官的獨裁專制、等級森嚴、壓制人性等法西斯式作風十分反感。當然，在這場實力懸殊的兩種主義的鬥爭中，赫恩的下場只能是悲劇，他被卡明斯派去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而被推上死亡之路。詹姆士·瓊斯的《從這裡到永恒》塑造的是美軍中一批法西斯分子的形象，他們個個上級壓迫下級，士兵們則成天酗酒、打架、玩女人，表現了十足的獸性，戰爭和軍隊的非人環境讓人性淪喪為獸性。至於約翰·赫西的《廣島浩劫》和庫特·馮尼格特的《五號屠場》更直接描寫了美軍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和英美聯軍瘋狂轟炸德國古城德累斯頓所造成的巨大人間悲劇。<sup>⑧</sup>批判的矛頭已經超越政治和道義等道德層面，而直逼戰爭本身，因為任何戰爭都是對文明的破壞、是對生命漠視，都應當堅決反對。

把美國二戰小說之反戰思想推向登峰造極的當數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創作態度十分嚴謹的海勒在 60 年代初向美國社會推出一部“很不嚴肅的反戰小說”（美國二戰小說評論家沃德梅爾語）。<sup>⑨</sup>這篇小說以“黑色幽默”的諷刺筆法，塑造了二戰美軍中一批“瘋子”的形象。這些駐紮在意大利皮亞諾紮島上美軍飛行大隊的官兵之所以成為“瘋子”都是那條看不見的“第二十二條軍規”逼的，如“第二十二條軍規”規定，凡是神志不清者必須停飛，但需本人提出申請，一旦提出申請就說明他神志清醒，不是瘋子，那就還得執行飛行任務；按照“第二十二條軍規”，每個飛行員飛完規定次數就可以回家，但軍規又規定必須服從每一個命令，於是卡思卡特上校就不斷加碼飛行次數，使得飛行員們永遠沒有回家的可能；還有那個只當了四天二等兵就直接晉升為少校的中隊長梅傑只有當他不在屋子裡的時候才允許部下進屋見他；為了逃避飛行任務，善於裝病的約塞連上尉授意斯納克下士在白薯裡放洗衣皂，造成人人鬧肚子，飛行員們明知白薯裡放了洗衣皂卻人人爭吃，結果轟炸任務不得一次又一次延期；米洛中尉利用當食堂管理員的便利，以改善食堂管理和夥食為由，用手中掌握的幾架飛機，在世界各地穿梭，大搞投機生意，發戰爭財，他所成立的果蔬產品聯合公司，成員甚至包括美國的敵人——德國。諸如此類荒誕鬧劇不斷在軍營中上演。《第二十二條軍規》之所以成為美國二戰小說的巔峰之作，不僅在於其荒誕幽默的戰爭敘事顛覆了美國戰爭小說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的藝術傳統，更在於作品背後的隱喻——作家看似寫戰爭中美國軍人們的荒誕言行，實際影射的是戰後美國的政治生態。令讀者在忍俊不禁之餘引發嚴肅的思考。

與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戰爭文學的反戰潮流逆向而行，同一時期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小說正沿著延安開闢的“頌戰”道路高歌猛進。與美蘇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相比，戰後中國的反日本法西斯戰爭小說不僅在作品數量上遠遠落後於美蘇兩國，而且題材狹隘，藝術形式單一，最重要的是，幾乎所有作品對戰爭的認識及藝術表現都停留在所謂“人民戰爭”的層面，與十四年抗日戰爭艱巨、複

雜和巨大的犧牲以及由這場戰爭所留給世人的豐富想象和深刻教訓極不相稱。

眾所周知，中國的抗日戰爭前後歷時 14 年，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歐美戰場多了 8 年。在這漫長的戰爭歷程中，日本法西斯從北往南、由東向西逐漸蠶食中國，而剛剛擺脫了滿清王朝統治的中國，此時各種政治力量和地方軍閥還處於相互角力的混亂狀態，在此情形下，可謂一盤散沙的中國如何團結起來戰勝強悍的日本法西斯，既需要一個具有凝聚全民族力量領導全民族抗戰的政治軍事領袖和強大的軍事武裝，也需要全國民眾的積極參與，以及國際上正義國家的大力支持。遺憾的是，豐富多彩的抗戰圖景在戰後中國的戰爭小說中卻只作單色調的敷衍，即只表現戰爭中民眾的力量，而忽略戰爭主戰場的奮鬥犧牲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支援。綜觀從延安抗日根據地開始到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的所有抗日小說，反映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開闢敵後抗日武裝鬥爭題材的小說占據絕對主流，人們耳熟能詳的《洋鐵桶的故事》、《呂梁英雄傳》、《新兒女英雄傳》、《平原烈火》、《銅牆鐵壁》、《敵後武工隊》、《鐵道游擊隊》、《苦菜花》、《戰鬥的青春》、《野火春風鬥古城》、《平原槍聲》、《戰鬥在滹沱河上》、《大江風雷》、《大刀記》、《風雲初記》等長篇小說以及孫犁、柳青、丁玲、劉白羽等作家創作的短篇抗戰小說，題材無一不局限在抗日根據地及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因此，從作品數量和題材方面看，可以說新中國建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戰小說與同時期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相距甚遠。

戰爭是一面多棱鏡——英雄在戰爭中崛起，將帥通過戰爭建立功業，戰爭考驗了民族意志，現代戰爭還讓軍火商發了橫財。然而，戰爭也毀滅了家園，戰爭讓無數生命消逝，戰爭讓人性徹底曝光……。無可否認，在這多棱鏡透視的戰爭場景上，戰爭英雄常常是聚焦點。對戰爭英雄的歌頌向來是古今中外戰爭文學熱衷的主題，且不說中國古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說唐演義》、《楊家將演義》、《說岳全傳》和古希臘的《荷馬史詩》，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戰爭文學中頌揚戰爭英雄的作品也不在少數，然而，為什麼當代文學界卻認同人道主義的反戰文學是戰後世界戰爭文學的主流，而沒有將頌揚戰爭英雄歌頌愛國主義的作品奉為主流，實乃基於人類愛好和平的共通人性，無論蘇聯還是美國，反戰小說的作者通常都親身經歷過戰爭的浩劫，對於戰爭的反人類性有切身體會，他們多從自身的感性經驗中深切理解人與戰爭的關係，從而超越了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狹隘認知，而升華到人性和人類的高度。同樣，中國“十七年”抗戰小說的作者也多是從抗戰歲月走過來的，其中部分作者是戰鬥部隊的成員，但卻沒人能從人道主義的反戰的視角來反映戰爭描寫戰爭，究其原因，既有作家自身政治立場、文化觀念、文學修養等主觀因素制約，更有政治規訓、文藝政策、時代審美風尚等外在因素的影響。關於“十七年”抗戰小說悖逆於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原因將在下文詳述，這裡著重對“人民戰爭”思想在“十七年”抗戰小說中的藝術呈現作若干簡析。

“人民”是一個與國家、民族具有同質概念的宏大所指，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民”更多的是一種帶有與“敵人”相對立的階級屬性與政治分野。“人民戰爭”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sup>⑩</sup>、“兵民是勝利之本”<sup>⑪</sup>。毛澤東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sup>⑫</sup>在戰爭文學創作中，毛澤東文藝思想和軍事思想都是創作中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按照“人民戰爭”思想，戰爭文學創作中必須突出人民在戰爭中的主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因此，無論抗日根據地的戰爭小說還是“十七年”的抗戰小說，都大致遵循以下的敘事程式：其一，小說主人公無一不是武裝起來的農民和工人，或是資產

階級出身經過思想改造後具備共產主義覺悟的黨和軍隊的基層幹部,如《洋鐵桶的故事》中的吳貴,《新兒女英雄傳》中的牛大水,《鐵道游擊隊》中山東魯南的眾鐵路工人,《平原槍聲》中的馬英,《敵後武工隊》中的魏強,《苦菜花》中的娟子,《戰鬥的青春》中的許鳳、李鐵,《烈火金剛》中的史更新、齊英、丁尚武、孫定邦,《大江風雷》中的夏鐵友、何為,等等。其二,主人公身份既定,則他們的形象必須高大正面,對於戰爭必定抱著極大的熱情,無論戰爭形勢多麼艱苦、犧牲多麼巨大,他們都始終洋溢著必勝的信念和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同時,他們還善於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掌握對敵鬥爭的高超策略和制勝方法,通常是以少勝多,以智取勝,總是讓敵人聞風喪膽,最後必定贏來戰爭的勝利。其三,由於出身於受苦受難的被壓迫被剝削階級,他們天生或經過一定思想教育改造後都具備了很高的思想政治覺悟,對黨忠誠,愛憎分明,道德高尚,行為端正,沒有私心雜念,愛欲極低或無,無懼犧牲。總之,他們集中的是人世間最高尚和最優秀的品質。其四,在戰爭描寫上根據游擊戰爭的特點,多以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機動靈活的小規模戰鬥為故事藍本;戰鬥對象以日本鬼子和漢奸偽軍為主,兼及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武裝;多在描寫戰鬥場景上下功夫,努力展示我方在戰鬥中的英勇頑強,敵人的猥瑣無能,不堪一擊;在描寫敵寇鎮壓中國百姓的場景上,以揭露敵人的殘暴、軍民的相互掩護為主,一般不過多渲染令讀者感官不適的恐怖血腥細節;為了增強故事情節的曲折性豐富性,也時有針對內部立場動搖、思想變節和叛變投敵分子的鬥爭;偶爾忽閃過戰爭中人性人道的微光。

關於“十七年”戰爭小說的美學風格及與世界主流戰爭文學的悖逆,陳思和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它表現為強調戰爭的最終勝利意義,將過程的意義溶解到最後的結果中去,將個體生命的價值溶解到集體的勝利中去。英雄人物不會輕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時候,也必須要用更大的勝利場面去沖淡它的悲劇氣氛。英雄的死不能引起傳統悲劇中的恐懼效果,而是以道德價值的認識來取代生命本體價值的認識,其結果消解了戰爭文學的悲劇美學效果。因此,中國當代戰爭小說不像西方戰爭小說那樣重在通過戰爭表現對人類命運、對個體命運遭遇的觀照,體現對人的存在意義和生命意義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現戰爭中的群體風貌、戰爭的整體和現實結果。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作家對戰爭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對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個體命運和生命價值的忽視。”<sup>⑬</sup>

若從延安時期起算至 1970 年代末,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文學與世界反法西斯主流戰爭文學失之交臂長達將近 40 年,在這戰爭文學創作的黃金時期,中國戰爭文學的發展長期游離於世界主流戰爭文學之外,是具有深刻的政治、軍事、文化、文學的多重原因。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對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分裂為以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一方和以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另一方的東西方兩大相互對立的陣營。朝鮮戰爭的爆發把中國卷入與美國的熱戰中,同時,潰退台灣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由於得到美國的支持,正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反攻大陸,顛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重大威脅。雖然大規模的戰爭已經結束,但戰爭之弦依然緊繃一刻也沒能放鬆,加上美國社會中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麥卡錫主義”正甚囂塵上,1950 年代中期蘇共 20 大赫魯曉夫上台執政開始了對斯大林錯誤的清算,中蘇兩黨之間發生激烈論戰,兩國兄弟友誼終結,蘇聯陳兵百萬於中蘇邊境,並與中國軍隊發生了小規模的邊境武裝衝突。這一切都讓進入和平建設的中國社會依然籠罩在戰爭的氛圍中,人們的思維慣性也依然行進在戰爭的軌道上。在長達 30 多年的中西對抗、中蘇對抗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始終處於潛在的戰爭威脅中,對此人們既擔憂,又必須勇敢面對,“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口

號因此響徹了 30 多年,而保持戰鬥意志,鼓舞勝利信心是戰爭文學必須承擔的責任。致力於塑造戰爭英雄的“頌戰”小說正當其時,相反,反戰文學則沒有賴以生長的社會環境。

其二,“頌戰”是中國戰爭文學的傳統,從遠古神話傳說對黃帝戰蚩尤的千古傳頌,到《三國演義》對劉、關、張、諸葛亮等王朝爭霸中戰爭英雄的津津樂道,《說岳全傳》、《楊家將演義》等對抗禦外敵的民族英雄的敬仰,中國戰爭文化歷史悠久、傳統深厚,中國上下五千年的社會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王朝更迭、漢夷爭戰的戰爭史,在勝王敗寇的歷史輪回中,無數戰爭英雄鑄就了民族的光輝歷史。然而,19 世紀中葉以後,老大帝國卻跌入了屢被西方列強凌辱的恥辱歷史遭遇中,百年反抗外敵侵略的悲壯歷史終於以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落幕。面對抗日戰爭這樣百年難得的民族的輝煌勝利,既往的屈辱和苦難仿佛在國人的勝利歡呼聲中得到完全消解,何況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抗戰發展壯大了自己,並乘勝追擊,把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攆到了台灣島一隅,從而奪取了國家政權。新中國的建立及其政權合法性的溯源也迫切需要以戰爭的勝利進行確證,而戰爭小說正是以藝術形式“潤物細無聲”地進行這種溯源和確證的最佳手段,因此“頌戰”傳統得到繼續發揚光大。

其三,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為解放區以及未來新中國的文藝發展作了政治規訓後,作家們無不自覺遵照領袖指引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方向開展文學創作。戰爭小說是褒揚中國共產黨創建新中國的歷史功績、堅定道路自信、鼓舞民族鬥志、贏取青少年對英雄敬仰的最佳藝術形式和輿論宣傳工具。相較於其他題材的文學創作,戰爭題材小說政治敏感性更強,作家的政治立場必須格外鮮明,況且新中國建立後活躍在文壇上的戰爭小說家絕大多數是從解放區走出來的,其中只有少數人曾經歷過軍隊的戰鬥生活,多數是文藝幹部或新聞記者,對於戰爭的殘酷性缺少切身體會,尤其缺少對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浴血奮戰事跡的了解,在表達上也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制約,這是造成“十七年”抗戰小說題材單一,藝術想象力貧乏的重要原因之一。無論美國還是蘇聯,戰後能夠創作出享譽世界的戰爭小說名著的作家絕大多數是親身參加了前線戰鬥的軍人。生活是藝術的源泉,沒有深切的戰爭體會,不可能有戰爭精品的問世。

綜上所述,由於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和作家主觀條件的多重局限,導致新中國建立初期“十七年”的抗戰小說長期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主流不同調。如果我們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比喻為一曲宏大的樂章,那麼,美蘇吹奏的是反戰的管弦樂協奏曲,中國則吹奏的是一曲格調獨異的“頌戰”的民族樂歌。好在世界文學史上,同曲不同調,同題不同文的現象十分普遍,獨戰爭小說乎?

### 下篇：新時期抗戰小說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有限鏡鑒

雖然滯後了 40 多年,但終於盼來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春風給閉鎖已久的中國文學殿堂推開了一扇門。但新時期戰爭文學的起步仍然艱難,由於人們被“左”的思想禁錮太久,文學觀念的更新遇到重重阻力,對於來自西方世界的各種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學文化思潮仍噤若寒蟬。猶記得,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當人道主義思想開始在新時期文壇萌芽,就立即招來一陣狂風暴雨,由“傷痕文學”的創作及評論引發了理論界對於人道主義“異化”、人性等問題的激烈論爭。朱光潛於 1979 年發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認為人性“就是人類自然本性”,“人道主義事實上是存在的。有人性,就有人的道德”。<sup>④</sup>朱光潛、汝信、王若水、李澤厚等人通過對《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經典文本的解讀重新論述了“人學”、“異化”的理念,試圖以“回到馬克思”的方式來強調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對人的價值的重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

的重要地位。<sup>⑮</sup>邢賁思、計永佑、陸梅林等人撰文反駁，認為汝信們將人道主義劃分為廣義和狹義的做法，只是為了“抹煞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sup>⑯</sup>“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同人道主義的等同，使馬克思主義消融於人道主義”，實際上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挑戰”。<sup>⑰</sup>文藝界權威周揚介入論爭，他發表長文《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異化”的存在，質疑了建國以來文學作品對“人”的否定，認為將人道主義當作修正主義的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錯誤的”。<sup>⑱</sup>胡喬木代表上層對周揚的文章進行了全面駁斥，認為“人道主義並不能說明馬克思主義，不能補充、糾正或發展馬克思主義。”<sup>⑲</sup>同時批評一些“同志”“拋開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的方法，把如此複雜的問題簡化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異化”，“在認識上不能推進任何對真理的接近，在實踐上不能提供任何解決的辦法”，只能“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黨和政府的領導”，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和悲觀心理。”<sup>⑳</sup>這些批評導致人道主義觀點被列為1983~1984年開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對象。最終，19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義爭鳴被定性為“帶有根本性質的錯誤觀點”，這場運動也被戴上“危險”的帽子而倉促落幕，“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因為這一批判運動，在1984年告一段落。”<sup>㉑</sup>

因此，新時期初期的抗戰小說對於歐美反法西斯戰爭小說的借鑒不得不避開人性人道主義反戰之類的敏感話題，而主要是對“十七年”抗戰小說題材、主題的糾偏。前已述及，“十七年”抗戰小說只局限於反映抗日根據地的游擊戰爭，而基本不涉正面戰場，這對於反映抗日戰爭歷史的全貌是一個缺憾。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規模空前的重大戰爭事件，全景式的戰爭小說必不可少，但也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才能實現對歷史客觀正確的藝術重現。蘇聯和美國也是在戰後二十多年才開始湧現出一批二戰題材的全景式的戰爭小說，如蘇聯作家邦達列夫的《熱的雪》（1969）、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三部曲（《生者與死者》、《軍人不是天生的》、《最後一個夏天》）（1955~1971）、恰科夫斯基的《圍困》（1968~1975）等。《熱的雪》描寫1942年蘇聯紅軍全殲被圍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軍的故事；《生者與死者》通過主人公軍事記者辛佐夫和集團軍司令謝爾皮林的在戰爭中的經歷，反映了蘇聯軍民從戰爭初期大撤退到1944年夏天白俄羅斯戰役中的若干重要戰爭事件；《圍困》描寫列寧格勒保衛戰。蘇聯這些戰爭小說之所以被譽為“全景小說”，不僅因為涉及許多重大戰爭事件，而且塑造了從普通民眾、基層官兵到斯大林等蘇聯最高統帥部眾多高級將帥的生動形象。美國著名作家赫爾曼·沃克也在1971年和1978年先後出版了具有全景意義的長篇小說《戰爭風雲》和《戰爭與回憶》，前者從1939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開始至1941年12月美國珍珠港受到日軍攻擊結束，後者從珍珠港事件起敘至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結束。小說通過美國海軍軍官維克多·亨利一家在戰爭中的悲歡離合，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幾乎所有重大戰爭事件和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等重要戰爭歷史人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國家紛紛出版戰爭全景小說，對中國作家不無啟示和鞭策，老作家周而復是最早嘗試這一艱巨工作的“吃螃蟹”者，從1977年開始，他即著手撰著一部反映抗日戰爭全過程的長篇巨著，歷時十多年，於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陸續出版了六卷本四百多萬字的鴻篇巨制《長城萬里圖》，與此同時，老幹部老作家李爾重亦披肝瀝血完成了八卷本五百多萬字的長篇《新戰爭與和平》。兩部具有史詩意義的抗戰全景小說的出版，表明中國的抗戰小說創作雖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落後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主流，但從1970年代末起邁開了追趕的步伐。與上述美蘇兩國的戰爭全景小說相比，《長城萬里圖》和《新戰爭與和平》在作品的篇幅上毫不遜色，但在歷史觀戰爭觀上依然受限於政治立場，對於戰爭歷史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戰爭事件的客觀公正敘述還有可議之處，更不用說去觸

碰諸如透過戰爭表象揭示戰爭的本質之類的深層主題。

高層對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論爭的政治裁判,初衷是警示新時期文學對於人道主義的探求,然而論爭的結果客觀上反而促進了人道主義思想的傳播。抗戰小說創作中,那些與正統單聲道主流歷史闡釋“唱反調”的作品正是出現在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論爭之後。人道主義作為一種人性向善的人類的共同訴求,雖然是超越階級和民族之上的,但它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也是可以兼容並包的,蘇聯在二戰後出版的反法西斯戰爭小說在宣揚人性愛、人道主義的同時並未排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傳統思想。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相同,蘇聯的衛國戰爭和中國的抗日戰爭都是反侵略戰爭,但是由於 1960 年代之後中蘇關係惡化,我們將蘇聯所有反撥歷史謬誤的行為均視為修正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自然也在排斥之列,人性、人道主義成為文壇的禁忌。1986 年莫言的《紅高粱》問世,將審視抗戰歷史的目光聚焦於長期被正史遺忘在歷史裂隙裡的邊緣人物、邊緣事件,這在新時期抗戰小說創作中是石破天驚的。當然,《紅高粱》的問世,其意義不在於人道主義的回歸,實際上它與人道主義也基本無涉,而是極大地挑戰了長期占據文壇主流地位的抗戰正史觀和英雄史觀對戰爭文學的絕對統治,如同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的問世打破了蘇聯戰爭小說固守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等宏大敘事而漠視戰爭中普通人的命運的窠臼一樣,此後一批寫戰爭中普通人命運的作品陸續問世,人道主義從此占據了蘇聯戰爭小說的主流地位。和戰後蘇聯的戰爭小說創作情況迥然有異,新時期中國戰爭小說並未出現如同蘇聯人道主義那樣占據主流地位的創作潮流,雖然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新歷史主義思潮曾經較顯著影響了包括抗戰小說在內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創作,但那也只是眾聲喧囂中較響亮的一種聲音而已,還難以視為主流。至於人道主義的聲音,在新時期戰爭小說中更顯微弱,顯然與 80 年代初的那場爭論留下的後遺症有一定關係。90 年代中期老作家徐光耀發表短篇小說《忘不死的河》算是點亮了人道主義的一點微光,小說中“我”和房東康大伯父女之間的關係由疏遠到親近再到疏遠的變化過程是由康大伯父女認為“平日待人好著呢”的兩個“漢奸”被鋤奸科逮捕並槍斃所引發,涉及戰爭中如何善待普通人的生命這一人道主義問題。新時期抗戰小說的更多作品只是停留在人性的層面而未能探及人道主義的深層,比較有代表性的是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江蘇青年作家周梅森創作出版的以國民黨軍抗戰為題材的系列小說,這些命名為“戰爭與人”的系列小說在表現戰爭與人性、人的道德沖突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軍歌》描寫了戰俘營中那些為求個人活命而不惜出賣戰友的卑鄙行徑;《冷血》塑造了一個讓獸性吞沒人性的醜惡靈魂,當饑餓變成生命的最大威脅時,什麼愛情、友情、戰友情在生死抉擇面前都變得一文不值;《大捷》構思了一個荒誕的故事:為了報復卸甲甸百姓對軍紀敗壞的國軍士兵的懲罰,韓總司令竟強行將一千六百多條無辜生命以抗日的名義送上死路。戰爭是試金石,是顯微鏡,除了人性的善惡受到檢驗,戰爭中還可能遇到諸如個人榮譽、軍規軍紀與群體生死存亡的矛盾,《國殤》就把楊夢征軍長置於這樣的矛盾之中,為了保存屬下五千多殘部的生命,也為了保護陵城及陵城二十二萬百姓免遭戰火塗炭,楊夢征軍長在絕望中忍辱簽下了投降書,爾後飲彈自斃。究竟是軍規、軍紀和軍人的責任、榮譽重要,還是幾十萬生命的存亡重要,換言之,戰爭中的英雄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矛盾怎樣調和,熟輕熟重?《國殤》給出了似是而非的答案,引發了人們對於戰爭鐵血邏輯和人造主義道德矛盾的深刻思考。“戰爭與人”系列小說由於是以國民黨軍人為表現對象,是將人性和道德話語置於對異己力量的揭露和批判的背景下,與蘇聯戰爭小說人道主義的自我覺醒和美國反戰小說強烈的自我批判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是對美蘇戰爭小說的有限鏡鑒而已。

無論是贊頌還是批判,用人性和人道的標準去描寫去衡量國民黨軍人的戰爭行為其實是沒有

政治風險的,但如何從人性和人道的視角去塑造戰時日本軍人的形象則是抗戰小說中一個頗為敏感的話題。新時期抗戰小說的少量作品觸及這個敏感話題,葉兆言的《日本鬼子來了》中那個叫三良的日本鬼子由強姦阿慶嫂進而愛上了阿慶嫂,時常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帶著禮物來阿慶嫂家幫忙幹農活,哄孩子們玩,當三良的求愛最後遭到阿慶嫂拒絕的時候,他並沒有獸性大發,而是悻然離去;鄧友梅的《據點》中日軍上等兵片山、下等兵加藤和准尉都喜歡會日語的中國孩子鄧智廣,為他自由出入據點大開綠燈。這些日本鬼子人性化的形象是對以往抗日小說中一味以凶殘面目臉譜化、標籤化刻畫日本軍人形象的顛覆。當然,一些抗戰小說也塑造了若干具有反戰思想或加入反戰同盟的日本軍人的正面形象,則不屬於人性描寫的範疇。

人性、人道主義至今依然是中國戰爭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敏感話題,還有很多禁區橫亘在前。但願階級鬥爭話語的重返不會造成人道主義的消失。

## 結 語

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始終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話題。近代以來西風東漸,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逐漸建立了聯繫,尤其當代中國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將其置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大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20世紀上半葉,俄蘇和歐美由於連續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反思戰爭災難、追求人類和平成為戰後戰爭文學的重要主題。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的抗日戰爭歷時14年,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難、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頑強的抵抗精神鑄就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愛國主義情懷,因此,高舉愛國主義旗幟,頌揚戰爭英雄、渴望民族解放成為戰後抗戰小說的絕對主流。抗日戰爭的勝利洗刷了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極大地增強了民族的自信心與自豪感,民族主義思潮在戰後更加乘勢而上,加上新中國建立初期國內外政治軍事環境的依然險惡和人們經歷長期戰爭後思維慣性的戰爭化,民族主義思潮疊加階級鬥爭意識,讓共和國建國初期“十七年”的戰爭小說創作不僅沒能從戰爭中走出戰爭、超越戰爭,從戰爭苦難中反思戰爭,反而長期就戰爭寫戰爭,甚至歌頌戰爭迷戀戰爭。用“人民戰爭”的思想一統戰爭文學創作,用傳奇手法塑造英雄人物、竭力醜化矮化反面人物成為戰爭小說創作的思維定勢和既定框框,戰爭小說創作由此落入庸俗化、平面化的俗套中無可逃遁不能自拔長達三十多年,嚴重滯後於同時期以人道主義反戰思潮為標志的世界戰爭文學的主流。

20世紀末的20多年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黃金時期。由於執政黨文藝方針政策的調整,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藝創作獲得相對寬松的環境,作家們의思想和創作激情得到釋放,戰爭小說創作漸入“百花齊放”異彩各呈的佳境。人道主義問題的論爭客觀上給戰爭文學創作敞開了一道封閉已久的窗門,人性論、人道主義思想的微光點燃了戰爭小說家新的創作熱情,激發了他們探索人道主義戰爭文學的勇氣和力量,同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治思潮增強了一些戰爭小說家重新認識和評價抗日戰爭的歷史責任感,嘗試借鑒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有益經驗,以彼之長補己之短,逐漸擺脫庸俗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窠臼,20世紀末的抗戰小說在宏觀視野全面反映抗戰歷史的史詩創作上,在微觀層面挖掘歷史縫隙中的邊緣人物、邊緣事件的新歷史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創作上均取得了新的創作成就,拉近了與世界戰爭文學主流之間的差距。

波瀾壯闊的20世紀中國反侵略戰爭小說創作已經匯入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奔騰長河中漸逝漸遠,但其所激起的戰爭歷史反思、審美情感漣漪卻是悠遠不息的。人類的自然本性、政治經濟

軍事的激烈競爭導致 21 世紀的地球依然戰火瀰漫、硝煙四起，而且正在走向威脅人類生存、毀滅地球的核戰爭的懸崖邊上。因此，反思戰爭、追求和平、共建人類美好家園將是戰爭文學創作和研究的一個永恒課題。

①《文學問題》，1976 年第 10 期，轉引自陳敬詠：《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小說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365~366 頁。

②尼古拉耶夫：《人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旗》，1957 年第 4 期。

③蘇聯《文學報》1974 年 6 月 26 日，轉引自陳敬詠：《蘇聯反法西斯戰爭小說史》，第 366 頁。

④陳敬詠：《邦達列夫創作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年，第 28~29 頁。

⑤由於資料所限，本文主要以戰後美國戰爭小說為討論對象。

⑥⑦李公昭：《美國戰爭小說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73~274 頁；第 277~278 頁。

⑧1945 年 2 月 13 日，美英聯軍轟炸德累斯頓市，平民死亡人數達 135,000 人之多，遠遠超過了廣島原子彈轟炸的 71,379 人死亡。見李公昭：《美國戰爭小說史論》，第 327 頁。

⑨轉引自李公昭：《美國戰爭小說史論》，第 347 頁。

⑩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31 頁。

⑪⑫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09 頁；第 511~512 頁。

⑬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緒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57~58 頁。

⑭朱光潛：《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北京：《文藝研究》，1979 年第 3 期。

⑮王若水：《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編：《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6 頁。

⑯⑰邢貴思：《怎樣識別人道主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國內哲學動態編輯部編：《人性、人道主義問題討論集》，第 4 頁；第 6 頁。

⑱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周揚近作》，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年，第 248 頁。

⑲⑳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洪子誠編：《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1999》（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年，第 748 頁；第 773 頁。

㉑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05 頁。

作者簡介：陳穎，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教授，《海峽人文學刊》主編。福州 350007

[責任編輯 桑海]